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808

德布雷媒介学思想的逻辑架构与学术脉络

许子炎¹

(¹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24)

摘要: 德布雷媒介学思想逐步成为当代显学。这篇文章抽丝剥茧地提炼了各章中媒介学理论的建构逻辑。这包括德布雷媒介学思想的两重批判意识与问题意识, 以及研究的范畴、对象、路线、类型、价值立场、方法、注意事项和最终人文关怀等。本文还尝试根据本书及作者经历论证德布雷媒介学思想的学术脉络。本文认为, 德布雷媒介学可以回归到媒介环境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经典西方文艺作品等学术脉络之中。

关键词: 媒介学; 德布雷; 逻辑架构; 学术脉络

一、引言

德布雷媒介学思想逐步成为当代显学。在 CSSCI 中检索“媒介学”“媒介域(圈)”“德布雷”等关键词, 研究捕捉到近百篇核心期刊论文。德布雷媒介学已成为当代显学。德布雷将媒介学视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1-9]主要内容还是非史学的研究: 比如对媒介圈下一阶段的理论猜想, 或是对这一思想的介绍、分析和解读。中国大陆学者利用德布雷媒介学来开展的研究表现在 3 个方面: 1. 德布雷媒介学理论的中国本土化历史研究。2. 德布雷媒介学的传播思想史研究。3. 德布雷媒介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化传播(传承)研究。

但, 文献中少见对德布雷媒介学思想本身的逻辑架构梳理和学术脉络分析。而这些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德布雷媒介学的思想实质, 进而避免程式化的套用或误用。

二、德布雷媒介学的逻辑架构

一个学科的身份是由其范畴而非其对象界定的。比如研究对象同为一张桌子, 物理学关注其重量、密度等, 化学则关注其燃点、酸溶解性等。那么以研究对象划分学科或学术分工, 按照人文社科的自然主义视角, 很有可能是武断的。^{[10]228}在许多学科所折射的人类的光影中, 只有人是实在的。因此, 对象是虚幻的。几乎所有人文社科都声称自己在观察人类。这些声明中, 只有“人”是切实存在的。其他学科仅在以不同视角折射人的各个方面: 人的说话(语言学)、生产(经济学)、欲望(心理学)、群居(社会学)、统治(政治学)、学习(教育学)等。那么, 媒介学的视角就无需在特别的对象或对象领域中抽离出来。或者说, 以实在论, 除了人, 其他学科所承诺的对象也大概是虚幻的。所以, 媒介学也仅是观察人类的一个视角, 并和其他人文社科共享同一个研究对象——人。^{[11]3-4}其中超越传播(communication)的传承(transmission)视角, 就是媒介学。传播, 研究共时态的人与人的相互作用, 介质是空间; 传承, 研究历时态的代与代的相互作用, 介质是时间。进而, 媒介学的批判意识在于, 技术发展让我们驯化传播, 而这与传承不平衡。我们面临“传承危机”。“传承危机”是指一切偏向于时间的文化遗产都面临危机。这与我们今天所谈的“文化遗产传承”有所不同。“传承危机”指代与代之间的文化遗产普遍被传播技术干扰。而“文化遗产传承”则是保护有目录记载的文化遗产的行政努力。正因传承视角, 媒介学的问题意识是, 文化遗产“存在的物质和社会条件是什么?”^{[11]20}

媒介学认为, “媒介即信息”是一种思想混乱。媒介只随象征信息的变化而变化。事实信息则不然。比如, “2+3=5”的观点, 无论被写在什么材料上、用什么语言; 也无论是被说出来与被写出来, 显然都是对的。事实信息, 无关媒介。但在宗教信息中, 这一观点却倒显其巧妙。由于传承载体具备社会和材料的双重特性, 那么媒介显然构成象征信息的一部分。媒介泛指: “1. 符号表示的整体过程(清晰连贯的话语、书写符号、

作者简介: 许子炎(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传播学。

类似的图像等) 2. 社会交流规范 (说话或者作家所使用的语言) 3. 记录和存储的物理载体 (石块、羊皮纸、磁带、胶卷、光盘) 4. 同流通方式相对应的传播设备 (手抄本、影印本、数字版)。^{[11]37-38} 基于与象征信息的关系, 媒介学建构一个决定了一定类型的控制性信仰、具有独特时间性和团体组建方式的宏观范畴: 媒介圈 (也译作“媒介域”)。媒介圈赋予集体特征或一个时代的风格特征。曰“圈”, 为类比生物圈。类似地, 这种圈的认识无法直接从经验当中产生, 正如一个人眼镜被打碎后才会意识到眼镜的存在一样。但这便是媒介学的特点: 比较往往产生于改变之后。媒介圈囊括人类文化生态系统与文化团体。媒介圈通过技术革命更迭, 新旧交融, 并重塑了社会关系。

一如斯特劳斯对民族学的解释, 媒介学也只是“认识的新形式, 而不是知识的特殊来源。”媒介学关心“能够改变意识、认识和运输的设备品质”。^{[11]89} 媒介学研究是物质与文化的关系研究, 而非媒介物的研究。这一研究领域存在两个视角: 一是通过技术的象征作用自下而上进行, 二是通过象征物的技术条件自上而下进行。就“象征技术-象征物”的系统, 我们产生 3 类研究: 1. 系统内的相互作用研究; 2. 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研究: 一种新象征技术诞生带来不同“象征技术-象征物”系统的无限变化; 3. 系统转移的相互作用研究: 一种新象征物诞生重塑了特定象征技术的社会地位, 进而带来各个系统间的转移。例如, 社会主义思潮诞生重塑了铅版印刷的社会地位。这促动整个“媒介圈”各个系统之间转移变动。从事铅版印刷的技术精英们涌现了大量的工人先锋。^{[11]85}

媒介学关心的问题“不是分析符号世界, 而是要明白由符号发展成的世界。”^{[11]111} 漫长且具有强大规模的传承现象, 如何改变世界而非仅停留于想法, 就是媒介学的最终研究对象及其存在的主要原因。媒介学, 希望能将思想抑或是意识形态“去观念化”, 从而超越思想历史研究思想的接替过程与载体。一个思想, 改造世界的能力越强, 就越难被捕捉到它的传承载体。基督教何以收获如此多的信徒? 这是基督教回避的。共产主义思潮何以影响世界进展? 这也似乎也很少被共产主义阵营提及。这对于媒介学研究者是一个挑战。然而, 思想必然依靠中介传承。作为象征符号传承工具的媒介被媒介学解构为物质性组织载体 (OM) 物质性组织载体分为 1. 语言编码 (汉语、拉丁语、英语等) 2. 组织范围 (城市、学校、教堂) 3. 形成模式 (信息的概念结构) 和组织性物质载体 (MO) 组织性物质载体分为 1. 物理载体 (声波、赫兹电波等) 2. 表达方式 (文章、图像、声音等) 3. 运输设备 (印刷、道路、网络等) 的内外两方面。媒介学提倡在这些因素中交叉研究。德布雷的 1992 年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便是如此研究的。这篇文章已被译入中国大陆, 被收录在《媒介学宣言》书后。题名为《图像的生命与死亡: 从西方的角度看图像的历史》。^{[12]1-87}

符号学对符号附着载体的忽视, 使得媒介学往往在符号学的任务完成后才发挥作用。媒介学相信中介的双重身份, 这与符号学不同。而心理学在恒定领域中考察象征性传承的心理结构。比如经典的阿多诺 (Adorno) 研究, 认为每个人心里都需要“具有权威性的人物”, 所以就可以确定说在人身上存在一个稳定的“潜在的法西斯主义”心理结构。但, 法西斯主义最终收获亿万受众, 同样也依靠法西斯主义的喇叭、话筒、广播。这些载体本身不仅推动象征性传承, 也应当成为象征性传承中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媒介学则关注情感因素的媒介基础, 即不同载体中情感支配上的细微差别。这其中包含了象征性传承的秘密。社会学很少关注象征性传承; 其次, 技术并没有被社会学视为一个特殊复杂的现实来研究。对于托克维尔, 技术等于是简单的个人统一化; 对于迪尔凯姆, 技术相当于工作分工; 在韦伯这里, 技术是世界的理性化过程……对于大多数社会学家而言, 人类的行为被认为是和技术相对而独立的。批判社会学也直接将矛头直指象征统治, 将其等同为霸权主义。这也是对技术的无视。直至近年才有社会学家 (布鲁诺·拉图尔、安托涅·亨尼昂等) 对社会学提出质疑。语用学不仅同样剥离了符号和载体, 也如同心理学一般直接关注传播而非传承。传承 (代与代之间的) 很少依靠主体对主体的直接作用完成。比如当代中国学生为什么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甚至其中许多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难道是马克思和当代中国学生直接产生传播吗? 至少解释这个传承问题, 我们无法调用符号学、语用学或心理学对于人际传播的研究规律。因为最基本的研究范畴已经发生了改变。媒介学可以被视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区别在于, 媒介学有鲜明的现实批判意识。

媒介学的另一个批判意识在于, 揭示宏大叙事的形成过程。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媒介学需要警惕对技术前景过于乐观的估计。媒介学与其预言最新的媒介动态, 不如关注媒介历史。媒介学研究人员应当成为“考古-现代主义者”。^{[11]201} 媒介学关心在技术全球一体化背景下, 各个民族文化的震荡。这种考古最终要落在对技术试图统一各种文化所引发的“冲击-回应”的现代主义思辨当中。这实际上大大扩充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视野。以往的“冲击-回应”思考往往局限在“文明冲突”的叙事中。但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本身依靠媒介完成。媒介转型和文化冲击相伴共生。更要紧的是, 文化冲击是通过几个世纪才能见到效果的。如今深入中国人内心的“科学、民主”等观念, 也是依靠几代人间的传承才实现的。那么, 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动荡, 显然更需要媒介学考察象征性传承的经典理论。

三、德布雷媒介学的学术脉络

德布雷媒介学参考的思想来源包括媒介环境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典文艺作品等。媒介学思想的学理性是建构在对媒介环境学派的批判与继承之上的,这是学术脉络的主要来源。但学理之外的学术立场、价值等源自马克思主义信仰。德布雷曾于1965年追随切·格瓦拉于玻利维亚开展红色革命。德布雷20岁考入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25岁取得哲学教师资格,同年到古巴,在玻利维亚追随切·格瓦拉。德布雷于27岁被捕,33岁回到法国。期间接受了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故德布雷是放弃了在反法西斯战胜国担任教师的安逸生活,而选择为马克思主义献身革命。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较高层次的信仰。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意识,成为德布雷媒介学思想的主要学术脉络之一。本书字里行间夹杂着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的句子。此外,德布雷还在书中反复强调对于西方文艺作品以及相邻学科(符号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的思想资源的捕捉和借鉴。

(一) 媒介环境学派

德布雷媒介学建构了“传承”这样一个区别于“传播”的独特研究范畴,并依此区别了媒介学同其他学科的区别。在阐述“传承”与“传播”间的差异时,德布雷调用了“时间”和“空间”的学术概念,强调传承的时间性。这和英尼斯的传播偏向理论是高度相似的。德布雷论证媒介学中传承的纪念物时,和英尼斯论证偏向时间的传播一样着重分析了石头、碑文等纪念物。^{[11]24-27}区别在于,英尼斯依然是将共时态的传播区分为偏向时间和空间两类。但德布雷在此基础上直接将研究范畴确定为代与代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上,将媒介学确立为历时态的传承视角。那么,德布雷媒介学思想的基本观察点是依靠对英尼斯传播偏向理论的批判和继承来实现的。尽管,德布雷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出英尼斯。

在德布雷看来,不同人文社会学科无非是视角不同。而历时态的传承视角依然包括了德布雷无心探讨的知识传承。故德布雷详细地开展对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这一观点的批判:德布雷将信息分为象征信息和事实信息两类,进而将“媒介”与“信息”的联动仅仅局限在象征信息之中。德布雷否认事实信息也随着媒介的变化而变化。媒介学最终以象征性传承为基本研究范畴,显然是可以回归到经典媒介环境学派的学术脉络之中的。对媒介环境学派经典理论的批判与继承,德布雷找到了新的研究领域,进而才展开对“物质性组织-组织性物质”载体系统的研究范式论证。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媒介学在对媒介环境学派的批判与继承中开发出一片学术圈未被开垦的地,那么德布雷对这片地开垦方式的建构无不透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这方面,德布雷在本书中表现得尤为谦抑。略显牵强地说,德布雷在核心系统“物质性组织-组织性物质”的阐释中,表达出了他的唯物主义信念。“物质”成为德布雷理解媒介的基本视窗。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还是最明显地表达在全书大段对于基督教传承过程的剖析中。这些剖析也是德布雷为说明其研究范式所举的例子。但以他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导师资格论文中对“宗教唯物主义”的论述来看,德布雷不仅准确反映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对宗教的基本观点,而且创新地剖析了这一观点。德布雷也于书中引用过这句马克思的原话:“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也是现实生活痛苦的镇定剂。”德布雷在本书中详细剖析了基督教何以收获如今十几亿受众这一问题,进而将基督教极力回避(其他收获无数受众的思想亦然)的传承过程再现于本书之中。德布雷长期关注的客体就是宗教,他认为揭露宗教等宏大叙事传承的媒介过程就是以唯物主义的观点解构欺骗的运作过程。这种宗教唯物主义的认识既是贯穿于本书之中的、德布雷为演示其开创的研究范式所举的研究范例,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点的注脚和进一步发展。这些研究意义并不是作者强加的,而是德布雷希望实现的。德布雷在本书中说明,其希望对于宗教唯物主义的解读能够阐释清楚为什么宗教不仅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还是“现实生活痛苦的镇定剂”。这是德布雷媒介学思想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学术脉络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德布雷媒介学思想又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德布雷对此的表现相对明显。这体现在德布雷对媒介学两重批判意识的阐释之中。宏大叙事的批判意识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西欧知识分子之中。它的批判对象包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宣传批判,特别是美苏两国的宏大宣传批判。这后来成为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意识。德布雷对宗教传承的批判,意在揭露“天然正确的”宏大叙事何以俘获如此多的受众。媒介学的物质载体体系,被德布雷认为是解构宗教在内的宏大叙事发展受众这一过程的方法。这种解构的方法被德布雷认为是揭露欺骗形成的唯物主义批判手段。另一重批判意识也缘于经典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即传播技术何以破坏文化。自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就致力于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基础批判文化工业中传播技术对文化的破坏。德布雷

显然也是在回应这一议题；但区别在于，德布雷摆脱了蔑视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视角，也没有就此忽视流行文化中的大众抵抗力量，而是以相对客观的“传播-传承”范畴划分来阐释媒介技术对文化遗产的干扰。这里的“文化”显然也是精英主义视角下的文化，并且这里的“干扰”也是指注意力分散、数字劳工等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逻辑，故“传承危机”也可以回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那么媒介学的两重批判意识——宏大叙事唯物主义批判和“传承危机”，显然都批判和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批判意识，并提出了新的理解视角。

（三）经典西方文艺作品

德布雷的文学积累深厚，在本书中引用过“大智若愚”等中国传统谚语。故其许多论证细节来源于经典西方文艺作品。比如第3章标题“这个将毁灭那个”就摘自雨果的《巴黎圣母院》。^{[11]73-75}但这并非是“两张皮”的借用。德布雷在这篇文章中从媒介学视角详细分析了雨果对印刷术摧毁教堂的担忧，并依此来指出媒介学关心媒介关系系统而非媒介实体。散落于书页各处的对经典西方文艺作品的引证表明其十分重视对先贤著作中媒介学思想的挖掘。德布雷指出许多文艺作品背后的媒介学思考，比如瓦来里的《无所不在的攻占》对电视的预言和传播与传承的思考、巴尔扎克的《幻灭》与包含印刷与纸张在内的“文学链”思考以及马拉美的《有灵魂的文字》对不同载体和书写法所产生的不同叙述效果等等，不胜枚举。这一点也是德布雷在本书中明确表明的：“媒介学的目的是要将以往的观察研究，那些‘著名作者’的零散的直觉和概况性的东西变成形式化的东西并加以综合分析。”^{[11]102}他在本书中梳理了从柏拉图到当代作家的文艺作品中值得挖掘的媒介学思想。媒介学的学术脉络也和经典西方文艺作品的发展密不可分。

自不必多说的是，德布雷媒介学思想显然还受无数相邻学科的影响。比如德布雷捍卫媒介学合法性时使用的“代与代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齐美尔保护社会学合法性时强调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如出一辙。民族学谦虚地指出自己是“认识的新形式而不是知识的特殊来源。”德布雷直接照搬至媒介学。凡此种种。

四、结语

这篇文章抽丝剥茧地提炼了各章中媒介学理论的建构逻辑。这包括德布雷媒介学思想的两重批判意识与问题意识，以及研究的范畴、对象、路线、类型、价值立场、方法、注意事项和最终人文关怀等。本文还尝试根据本书及作者经历论证德布雷媒介学思想的学术脉络。本文认为，德布雷媒介学可以回归到媒介环境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经典西方文艺作品等学术脉络之中。

本文认为，未来还有3个方面理论价值应当得到关注：其一，德布雷媒介学显然不希望其研究者仅仅完成了档案的整理，它更希望能够通过史学研究关注到当下全球媒介进程中最为现实的技术文化问题。德布雷自己指出的是：在全球技术一体化背景下，不同文化震荡加剧的问题。这个现代主义问题可以通过媒介学对物质载体的分析，探讨不同文化形成和震荡的成因。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智能媒体时代的发展，难道不是在制造更多文化的冲突么？这种技术发展背景下的各个文化间的冲突，理应成为考古的分析对象。

其二，德布雷媒介学不应仅仅被当作一个程式化的客观分析工具来使用，它还有其作为灵魂的批判意识。许多已有史学研究仅以其分析了某段文化传承现象，这种庸俗化解读会影响媒介学的学术生命力。对于宏大叙事的唯物主义批判不应仅仅局限在对德布雷媒介学思想史的分析，还应作为“批判的武器”来对更多具有欺骗性的宏大叙事社会思潮开展批判。而这种批判也是媒介学的唯物主义灵魂。未来还应有更多从象征性传承层面开展针对现实社会思潮的唯物主义宏大叙事批判的史学研究。

其三，如何在新媒介技术环境中应对文化遗产危机，似乎应当是当下更为严峻的问题。但这一问题被关注得还不够。而这一问题除了常规从社会科学角度予以调查研究，也可以从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予以象征性传承范畴的关照。以物质载体体系为基本视角，研究可以考察传统文化如何传承至今，并思考该文化在当下技术进展中的传承危机问题；进而从物质载体体系的视角，给出具有实效的文化遗产建议。这些对文化遗产的关注也应当成为反哺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关照最新媒介技术进展的史学问题意识。

参考文献：

- [1] 许加彪, 程伟瀚. 理论引进与知识创新: 德布雷媒介学的中国本土化历程及省思[J]. 传媒观察, 2023, (11): 47-53.
- [2] 胡翼青, 张婧妍. “媒介世”: 物质性语境下传播理论研究的演进[J]. 编辑之友, 2022, (4): 128-140.
- [3] 马英俊. “文化”与“技术”: 论德布雷媒介学“合二为一”的历史[J]. 新闻大学, 2021, (4): 57-68+121.
- [4] 吕清远. 媒介学中的身体问题与身体研究的媒介学理路——探访一种中介化的身体传播思想[J]. 新闻大

- 学,2022,(7):1-13+116.
- [5] 朱振明, 付佳洁. 德布雷媒介学研究中的“物质性转向”[J].全球传媒学刊,2022,9(5):73-86.
- [6] 董卫民. 作为“中间体”的南宋皇城遗址: 媒介学视野下 地方复现与遗产传承[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5):149-156.
- [7] 张勇锋. 从“媒介革命”到“革命媒介”: 延安新秧歌运动再考察[J].新闻大学,2020,(10):55-68+120.
- [8] 董倩. 革命典型的“分身”与再塑——“南京路上好八连”早期传播的媒介学考察[J].探索与争鸣,2021,(5):139-151+180.
- [9] 彭志翔. 从纸上到街头: 工人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基于“五四”后《晨报》和《民国日报》的媒介学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30(5):113-125+128.
- [10] 奥德里库尔. 技术、人类科学[M].巴黎: 人文出版社,1987.
- [11] 雷吉斯·德布雷. 媒介学引论[M].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 [12] 雷吉斯·德布雷. 媒介学宣言[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The Logical Structure and Academic Venation of Debray's Media Theory

Ziyan XU¹

¹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Abstract: Debray's media theor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prominent discipline in contemporary academia. This article meticulously dissects and distill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logic of media theory presented in each chapter. This encompasses the dual critical and problem consciousness of Debray's media theory, as well as the scope, objects, approaches, types, value positions, methods, precautions, and ultimate humanistic concerns of the research. This article also attempts to trace the academic lineage of Debray's media theory based on this book and the author's experiences. It is argued that Debray's media the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academic lineages of the media ecology school, Western Marxism, and classic Western literary works.

Keywords: media theory; Debray; logical structure; academic venation